

RESEARCHES IN LITERATURE  
IN ENEMY-OCCUPIED  
AREA IN CHINA

# 沦陷区 中国文学研究 资料总汇

主 编 彭 放

副主编 李春燕 丛 坤 晓 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ISBN 7-207-07263-5



9 787207 072634 >

ISBN 7-207-07263-5/I·976

定价: 277.00 元

# 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

• 资料总汇 •

主 编 彭 放

副主编 李春燕 丛 坤 晓 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彭放等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7-207-07263-5

I. 中... II. ①彭... ②李... III. 文学研究—中国  
—1931~2004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041 号

---

责任编辑: 李文方 吴英杰  
装帧设计: 李 梅  
责任制版: 李淑杰

## 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

彭放等 主编

---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邮 箱 hlj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86.5  
字 数 2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ISBN 7-207-07263-5/I·976

---

定价: 277.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 凡 例

一、《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是一部资料性的工具书,分五编,十五章。分别是:

第一编 东北沦陷区(1—4章)

第二编 华北沦陷区(5—8章)

第三编 上海“孤岛”及沦陷时期(9—11章)

第四编 台港澳及海外研究(12—13章)

第五编 专著·作品·名录(14—15章)

二、资料时限。1931—2004年间,关于中国沦陷区所有相关的作家作品、研究论著、年表、大事记、综述、小传、笔名、回忆录、报刊目录、馆藏书目(包括内部资料)等,均在收录之列。

三、资料编排。每章分“文选”、“选目”、“存目”三部分。“文选”部分因篇幅所限分“全文选”和“节选”。“选目”只在显示文章重要,“略”去了内文。“存目”仅供检索查寻篇目之用。

四、本书资料纵跨时代久远,文中出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之类说法甚多,为尊重文章的历史面目,在不影响阅读,不产生歧义的原则下,保留不变。但写作和发表于2000年以后的作品,改为“20世纪××年代”。

五、篇目“出处”表示,主要借鉴现行“报刊资料索引”方法。因本资料涉及报刊种类繁多,注明文章出处的方法多种多样,难以做到全书统一。在保证读者能看懂的前提下,尽量保留原刊、原文的历史原貌,敬请读者同仁谅解。

六、条目“出处”的标准型例如:

萧红短篇小说论/李计谋//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985.1.148~153。表示该文发表于1985年第1期(月)第148~第153页。

七、条目“出处”的例外情况:

①萧红短篇小说论/李计谋//社会科学辑刊(沈阳)

1985.1.148~153 24

“24”前空一格,表示该文下转“第24页”。

②萧红短篇小说论/李计谋//社会科学辑刊(沈阳)

1985.1.148~153 8—25

“8—25”前空一格,表示该文被另一文摘类报刊转载。

③去故集 秋萤著 文丛刊行会,“康德八年”(1941)九月版。

④梁山丁:《文学的故乡》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二辑第96页。

八、原资料文章中的漏字、错字极尽编者水平补正,但一时找不到原书、原文可以查实订正的,用“?”表示,以保持历史原貌存疑。

# 总 序

曲 伟

2000年我院退休研究员彭放先生,在延聘三年中,完成《黑龙江文学通史》编撰后,提出要再编一部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大型工具书,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献给当年在日占区,坚持文学创作奉献了自己青春热血,直至宝贵生命的作家和英烈们。当时我认为,彭放先生提出的课题,有益于保存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资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研究也是一种内容的扩展和补充。当然我深知,完成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困难。尤其是作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没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甘于奉献的精神,是难以完成的。自此以后,彭放回到老家四川,坐守“川大”和“川师”两大图书馆,从浩如烟海已尘封的报刊资料中,验证搜求;积数年之努力,同他的合作者及家人,不辞劳苦,又多次去上海、北京,搜集资料,采访调查,终于如期完成了这本资料巨著。我怀着一种敬意和喜悦的心情,对参与本书选编和提供资料的教授和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对科研工作的执著和敬业精神,将伴随这本工具书的出版而传之久远。

沦陷区文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身陷沦陷区的作家创作的地下文学。它与“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共同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大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首先成了日占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是想把东三省沦为永久殖民地,他们在其占领区的征服,很注重于文化方面:一手是武力镇压,另一手是创办各种报刊,实行文化殖民统治。哈尔滨这个城市由于它毗邻俄罗斯,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成为当年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奔赴前线抗日救亡的据点,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在哈尔滨形成了最早的东北沦陷区北满作家群。如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罗烽、姜椿芳、骆宾基、金剑啸、林珏、塞克、孔罗荪等作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向南推移,华北、华中、华南、上海“孤岛”都相继成为了沦陷区,东北作家群流亡南方,沦陷区文学的革命火种洒遍全国。可以说,沦陷区文学是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抗战文学。作家们生活在日本占领区,其作品又要在日伪控制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这就注定了他们命运的悲苦和作品内容、写法的特殊性。首先,不能公开直接地去描写抗日题材,正面展现前方战场上那奋勇杀敌的惨烈,而只能用他们那支没有直接杀伤力的笔,去表达“遗民泪尽胡尘里”的痛苦与呻吟。这些在日警、特务严密监控下的抵抗作家,钻入敌人心脏,在隐秘战线,与嗜血成性的魔鬼、刽子手周旋,他们的生存环境与言说环境都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从我翻阅这本资料集中一些回忆文章看,许多沦陷区老作家,都深感于今天的读者(包括一些研究

他们的专家)对于他们当时写作处境的不理解。比如,30年代初在东北,后来流亡到台湾的老作家寒爵回忆说:当年他在一家报馆里当记者,而后做了编辑,每天编好的报纸都要打成大样,送到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逐字审查……稍有反映所谓“阴暗面”的字句,都要被删掉,重者作记录,追查作者。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看见抓人的囚车满街跑,不能说“抓人”和“恐怖”,而要这样写:“那囚车新漆的灰色,发着光泽,正象征着王道乐土的光明面”。他说,在日占区那种迂回隐喻式的文学,未亲历其境者恐怕是难以理解的。东北沦陷区另一老作家王秋萤,也谈到同样的情况。他说当年的沦陷区文学,很多是通过日伪控制的“合法”报刊发表的。抗日文学披上“合法”的外衣,作家发表作品,还要取得“合法”的身份,这有多难啊!一方面是精神饥渴,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不愿在黑暗中沉默和死亡;另一方面,还要靠写作谋生,这是物质饥渴。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与当时统治者在政治或文学上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复杂性搅在一起。他说当年我们这些人,就好像生活在“阴沟暗角里”。那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把一切都染了……即使你不愿在黑暗中沉默,不愿同流合污,有时也把你弄脏了”,<sup>①</sup>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能把日伪政权和这个政权控制的文学,当成一回事;也不能把日伪报刊上的政治宣传,和这个报刊上发表的文艺作品混为一谈,更“不能用现在的倾向”去想当然。一位研究王秋萤作品的日本学者冈田英树说:“《矿坑》,运用了为敌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表现手法”。<sup>②</sup>比如:作品中描写青年男女的苦闷心情,“让我们(日本读者)发现,这是表现在异族统治下青年人的悲愤”。沦陷区文学普遍存在着隐喻、暗示、象征、旁敲侧击的手法,作家以谈风月、男女、爱情、故乡、社会黑暗、历史人物和身边琐事等,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之上。沦陷区文学的这个特殊性,给后人的解读和研究带来许多误解和争论,这是要充分考虑到的。

因此,我们欢迎《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出版,这本资料检索总汇的工具书,它不仅给资料奇缺、年代久远,尚存许多分歧的沦陷区作家和文学的继续研究提供一本相当完备的资料,而且也为民族的浩然正气留下可资凭依的史实。

历史与文学都是人类的回忆。人类创造的文化资源,也都是由点点滴滴的历史资料积累起来的。牢记历史的教训,把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14年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沦陷区文学写入历史,不是要算历史旧账,冤冤相报,而是要以史为鉴,化剑为犁,重修旧好。中国人民这种捐弃前嫌的友好姿态,得到东邻读者和社会团体的拥护。在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方面,一些日本友好学者、教授、专家,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写出了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该书在“海外研究”一章,都一一记录在案,借以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和怀念,以飨读者。

是为序

2005年12月30日

哈尔滨

① 王秋萤:《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载《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3辑,1985年。

② [日]冈田英树著:《从王秋萤作品看东北沦陷的抗日文学》,载《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6辑,1987年12月。

# 前 言

黄万华

回顾近 20 年来国内关于抗战时期日占区文学研究的状况,进一步考察抗战时期日占区文学研究需要拓展深化的课题,对调整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是有意义的。

## —

从 1982 年 2 期《上海师院学报》发表柯灵《上海沦陷时期戏剧文学管窥》,1983 年 4 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张毓茂《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等文章开始,沦陷区文学研究是以一种“填补空白”的姿态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1995 年前后,《沦陷时期北京文学 8 年》(张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陈青生著)、《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徐迺翔、黄万华著)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也首先是在“搜索资料之丰富,甄别史料之细致”、“堪称独到”<sup>①</sup>上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1998 年至 2000 年,8 卷本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钱理群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副主编)出版,被誉为“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最后一项大空白”。

在此之前张毓茂主编的 14 卷《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还有东北黑龙江、辽宁省社科院文学所从 1980 年开始主编,内部发行的《东北现代文学史料》1~9 辑等,也有此类价值。前后 20 年沦陷区文学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填补空白”的姿态,明显呈现出这一领域文学形态的复杂性。而且即便是着重史料开掘的研究,也先后(1991 年和 2000 年)引起严厉的批评。这些似乎都表明,跟沦陷区文学对话的空间还远未构筑成,其中正包孕着不可忽视的学术生长力。

包括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等沦陷区文学和台湾殖民地文学在内的抗战时期日占区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形态,这是研究者们一直想弄清楚的。这种努力似乎首先在作家论这一微观研究层面上取得突破。早在 1990 年代初,就有了余彬《张爱玲传》那样在为作家立传中解读沦陷区文学之谜的专著,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各有分量的作家论,如吴福辉的《予

<sup>①</sup> 贾植芳:《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序》,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且小说论》<sup>①</sup>、范智红的《袁犀论》<sup>②</sup>和《关永吉论》<sup>③</sup>，还有《艺文志派文学初探》<sup>④</sup>、《艺文志派四作家论》<sup>⑤</sup>、《艺文志派文学的风貌》<sup>⑥</sup>，以及张泉的《毕基初论》<sup>⑦</sup>、徐迺翔的《梅娘论》<sup>⑧</sup>、岳玉杰的《试论梁山丁的乡土小说》<sup>⑨</sup>、余凌的《燕京校园诗人吴兴华》<sup>⑩</sup>、胡凌芝的《苏青论》<sup>⑪</sup>等等。

正是这些研究，对沦陷区文学起着“正名”作用。他们的创作具有文学史研究的价值，那种认为“编一部沦陷区文学选集已经足够”，并据此将沦陷区作家分成“少数爱国作家”和大多数或“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或“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sup>⑫</sup>的作家的判断，恐怕未必是日占区文学的历史真相。

## 二

在上述作家论问世的同时，孙中田发表了《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序〈东北沦陷区时期文学新论〉》<sup>⑬</sup>一文（以下称“孙文”），集中阐述了解读沦陷区作家作品的方法，正可以跟作家论互相印证，从而呈现 90 年代前期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孙文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精神劳动”，都“贵于求实，在于真诚地与历史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孙文首先强调，“对于在一定政治框架、文化统治夹缝中生活的沦陷区作家来说，更具有复杂的‘文化性格’”，他特别举出了古丁“这个既受日伪‘赏识’，又被严加监视；既以‘写印主义’造成论争，又坚持要用‘母语写作’；既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重要成员，又要在创作中‘缩短万民的距离’，把底层民众的苦难，放在自己的艺术观照之下”的作家，认为“要付出勇气和真识，要摆脱是与非、敌与我的两极批评模式”，去“品评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人”。这里论及的是对沦陷区文学生存环境、生存策略复杂性的认识。的确，跟二次大战期间，欧洲一些国家的沦陷区文学主要是由移居国外的作家创作的流亡文学和少数留在沦陷区的作家的地下文学这两部分组成的情况不同，中国沦陷区文学是在日伪统治的殖民政体环境中，通过各种出版渠道，其中相当部分是公开、“合法”的出版渠道来发行数量众多，包含着有力抗议的作品。“抵抗文学”要披上“合法”外衣，作家也往往取得着“合法”身份，作家由此也在种种表里不一中造成心灵的磨难、人格的“裂变”，造成“既……又……”那样的两种史实的矛盾。而在这种矛盾后面，隐藏的正是作家在殖民权力话语结构中的真实处境。

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②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③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 年第 1 期。

④ 《东北师大学报》1992 年第 2 期。

⑤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 年第 1 期。

⑥ 收入孙中田等著《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⑪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年第 1 期。

⑫ 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艺报》2000 年 1 月 11 日。

⑬ 冯为群、李春燕著：《东北沦陷区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有论者对古丁的研究就揭示了古丁依恃其民族文化的资源,对日本殖民文化权力宰制作出的抗争和屈从”。<sup>①</sup> 这样的研究都充分关注到了民族话语空间中政治空间和文学空间的分割和交替。在作家论方面,张爱玲研究可能是最多角度的了。许多论述都未将张爱玲拘囿于上海沦陷时期,而将她的创作或“延伸”于传统、现代,或“放大”于女性、都市,或联系于雅俗、新旧……在这众多的历史审察视角中,都有着对沦陷区文学生存空间的敏锐剖析,“张爱玲始终自居于大时代之外的边缘位置”,以“形而上的思索却恰恰得出了形而下的结论”<sup>②</sup>;她“开拓了文学领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间,同时也迎合了专制体制下的市民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她使原来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庙堂文化的相对立的交叉线,变成了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的平行线”<sup>③</sup>。这样一些结论实际上侧重于“另类”、“边缘”等话题,也都包含着如何在殖民文化专制空间中“游走”、“分割”、“生存”的历史思考。

日占区文学正是在法西斯政治铁蹄下,挑战着殖民话语权力。而研究者们都注意到,日占区文学恰恰是采取着几种较为特殊的文学形态,即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1980年代以来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也主要是在这几种文学形态的研究上取得着突破。对这几种或挑战、或疏离于殖民中心话语的“边缘”文学形态的研究,既揭示了日占区民族新文学的历史价值,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关于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的成果,从而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

### 三

相对于政治中心话语而言,乡土文学往往取边缘性姿态;相对于男权传统而言,女性文学更被长期放逐于边缘地带;而自“五四”新文学以来,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游离于新文学以外的文学形态。在“日据”时期都出于历史“意料”各有所兴盛,构成了日占区文学的基本格局。这无疑揭示了日占区文学史中存在着中心——边缘这样一种基本框架,在日占区,由国家、民族关系决定的主宰和被主宰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置于被殖民的边缘状态,不断加深着人们遭主宰、受胁迫、被殖民等边缘体验。正是这种边缘结构、边缘状态、边缘体验的同一指向性使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都成为日占区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生存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日占区乡土文学的有关研究,战时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指向明确的思潮恰恰发生在日占区,其特殊运动的历史轨迹大致引发于台湾(1931年前后),蔓延于东北(1939年前后),1942年下半年起则在华北文坛形成一股潮流。研究者们都充分注意到了异族统治下乡土文学隐喻的丰富内涵。对台湾“日据”下的乡土文学,研究者注意到的是它的文化视角,认为“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紧地联系在一

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② 黄万华:《艺文志派四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1期。

③ 黄万华:《艺文志派四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1期。

起”<sup>①</sup>。面对日本殖民当局从语言到习俗的全面同化,“乡土性”的开掘成为台湾文学对抗殖民同化唯一可行且最有效的内容,它以“另类‘现代性’”的内容抵抗和消解着日本资本主义“这一外来的亚洲式‘现代性’”,“体现的恰恰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强权压抑下的被压迫着的意识,与众多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意识’或‘经验’息息相通”<sup>②</sup>。当社会的抵抗越来越不可能时,语言、风俗等层面的抵抗,却越发顽强。在语言层面,或借助于“台语”(闽南语等汉语方言)来颠覆日语的“中心”地位,如吴浊流《先生妈》所写;或在日文形式中嵌入中文的历史意识,乃至表达形式,如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在风土习俗层面,乡土文学更顽强地承担起保存民族集体记忆的任务。跟历史上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有所不同,二次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是跟它同属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两国文化的相近性,使得日本在其中国占领区的征服更注重文化、习俗上的同化。在这种语境中,战时台湾文学不遗余力地描写乡俗民风,其抗争意识是显见的。而在台湾作家作品中大量被描写的汉民族习俗,往往有着日本殖民者难以悟透而中国民众完全心领神会的民心民情,张文环的小说《夜猿》、《阉鸡》等当时被日本人视为“猜不透的谜”,其缘由实际上就在此。<sup>③</sup> 上述抵抗中包孕着“边缘”和“中心”的一种对峙:“边缘”明确挑战、抗衡于“中心”,“中心”却惘然以对。这也许正揭示了,战时台湾乡土文学“边缘”形态孕蓄的活力。

事实上,即便在以往属于乡土文学层面的风俗描写,在战时台湾文学中也表现为外来殖民文化跟台湾本土文化的一种“搏战”。这集中体现在“外地文学”和“本土文学”两种立场的交锋上。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由日人西川满主导下的《文艺台湾》被视为“外地文学”,主要是因为它强调“异国情调”、“外地经验”,即强调以殖民阶级的“内地人”眼光、心态去表现作为殖民地的“外地”风俗景观,当地民族“外地人”的生活形态等,所以,尽管其也描写台湾风俗,但“追求的‘异国情调’‘外地经验’,完全是以日本人的立场为本位,这中间毫无台湾民众心灵存在的空间”。潜在而又分明的对峙于《文艺台湾》的是张文环等人主持的《台湾文学》,其“本土文学”立场使《台湾文学》所刊作品的地域风情描写始终呈现的是台湾中国人的眼光、心态,沉积着悠久而丰富的汉民族集体记忆。《文艺台湾》的“想象台湾”和《台湾文学》的“台湾想象”,正是外来殖民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间的激烈撞击。朱双一的《西川满殖民文学的后殖民解读》<sup>④</sup> 就直接指出了西川满小说“异国情调中的殖民意图”,认为“那些台湾风俗民情、异域情调描写”是“打着观察、研究和了解台湾民间习俗、乃至披着慕恋台湾、热爱台湾的外装”,实际上却是在激发“殖民占有中国”的阅读期待。

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实践也一开始就表现出跟殖民中心话语对峙的价值取向。不少研究者都关注到当时东北文学界有一种乡土文学、国民文学、世界文学的文学阶段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反映了“以殖民文学取代乡土文学”的“话语权的争夺”<sup>⑤</sup>。正是意识

① 陈马林:《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困惑》,见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② 黎湘萍:《文学台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③ 黄万华:《从社会心理到习俗、语言:战时台湾文学中的抵抗意识》,《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

⑤ 孙中田:《“文丛”派、“文选”派和“乡土文学”》,《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到这种争夺,东北作家才较自觉、系统地提出了“乡土文学”的主张,一是将“乡土”扩展至日本统治下的整个东北,二是将“暴露乡土现实”作为其思想内核,三是以“发源于民间”的民族血脉的维系抗衡日人的“移植文学”。对于上述对峙,有人指出,“在东北进步作家倡导乡土文学前后,殖民主义及其文化的代表者也在推行另一种‘乡土’或‘地域’文学”,“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层蕴藏着‘话语权’的自主与控制的斗争”<sup>①</sup>。

#### 四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日占区女性文学研究的状况。

沦陷区女性文学的研究开始是被置于民族解放战争“引发了文学创作对充满雄强之气的力之美的追求”<sup>②</sup>这样一种文学史视野中的,但随着对张爱玲、杨绛、苏青、梅娘、但娣等风格各异的女作家研究的深入,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丰富内涵也得到了揭示。逢增玉在其《女性作家群体的小说》<sup>③</sup>中曾这样比较沦陷区女作家的创作:“张爱玲着意于以冷峻悲凉之笔揭示了女人母性与妻性的异化过程”,“苏青则以大胆直率地抒写了世俗社会中饮食男女的情欲世界著称”,相比之下,“东北沦陷区女作家对女性性别形态强烈关注的”是“女性的刑罚”。这种比较揭示了女性文学颠覆男权话语的不同方式,这表明女性文学对父权制度、男权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一后殖民命题成为日占区女性文学研究中关注的焦点。

沦陷区女性文学往往跟文学的其他边缘形态相交织,使之更有历史意味。当年李健吾将杨绛的剧作看做是继丁西林之后中国“真正的风俗喜剧”的“第二道纪程碑”,就在于杨绛剧作是“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sup>④</sup>,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杨绛剧作的出现,以她特有的魅力在风俗喜剧这一形态上沟通了学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联系”,甚至避免了“‘知识分子’从有知识的‘世俗’大众中异化出去”的“文化疾病”,是真正“属于上海沦陷那一特殊时期的”,<sup>⑤</sup>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女性的、通俗的、乡土的多重“边缘”形态。有研究者则更将张爱玲跟杨绛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位“对于世界有着不同认知底子的”女作家“凭着女性特有的敏锐的直觉和观察,洞彻人情世故底毫芒纤悉和旧家庭亲长姻娅之间底微妙关系”,在选材和勾勒具有吴越地域特征的人物和世态方面,在对普通人生的肯定以及充满海派的华彩缤纷的对白方面,有着众多契合”<sup>⑥</sup>。这种契合正是发生在“雅”“俗”关系、地域乡土等层面的。多重“边缘”的叠合,也会是多个“中心圈”的交叉重

① 孙中田:《“文丛”派、“文选”派和“乡土文学”》,《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② 黄万华:《沉郁的现实感,雄健的审美感——论东北沦陷时期女性文学的特征》,《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

③ 孙中田:《“文丛”派、“文选”派和“乡土文学”》,《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

④ 孟度:《关于杨绛的话》,1945年15卷2期《风雨谈》。

⑤ 黄万华:《杨绛喜剧:学者的“粗俗”创作》,《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戏剧卷二》,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

⑥ 朱伟华:《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戏剧卷·导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合,从而使被殖民文学能孕积起多种文化资源,构成对殖民中心话语强有力的挑战姿态,也有利于保存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多种意义。

日占区女性文学研究能进入后殖民语境,而且由于其特异性而推动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有研究者在论及张爱玲、杨绛、苏青这几位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母性书写”时,就充分注意到了当时女性文学中的一些独异倾向。例如,“苏青的写作较为倾向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尤其是通过身体的写作,显示出女性的‘身体就是父权社会的象征和父权的符号意义’”,“由此可颠覆男性社会中女性身体话语系统,试图冲击男性文化的结构”,这“在当时的话语圈里,尤其是在女性几乎没有理论的文学创作背景里”,让人们“极为赞叹”<sup>①</sup>。这种研究,澄清了女性“躯体写作”的本义以及它跟历史的关系,对当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及其理论关注都是有启迪意义的。

## 五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占区通俗文学研究的状况。

严家炎在给孔庆东的《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作序时,十分赞赏孔庆东得出的“雅俗文学‘结合部地带’,常常体现‘一个民族总体文学水平的提高’”<sup>②</sup>的结论,而孔庆东的这一结论,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他认为“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当推通俗小说的繁荣和进步”<sup>③</sup>及由此展开的论析。沦陷区通俗文学的兴盛,正是在日本殖民当局“把安慰和娱乐赠与他们(指沦陷区民众——笔者),然后慢慢地使他们理解我们的主张”<sup>④</sup>的政策跟“王道”文化下,对政治“实觉无从谈起”,而“遍地烽烟”,对“风月”“亦觉不忍再谈”,只好“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sup>⑤</sup>作家生存状态“契合”的结果。所以,通俗文学在人事关系、发表方式等方面,可能“与各种背景复杂的刊物发生关系”,“但其作品表现生活”,“不直接指涉政治”,“还是提供了能从文学范畴来认定他的价值之可能”<sup>⑥</sup>,这成为研究者们的一种共识。从而在沦陷区能“言”的层面上来开掘其文学价值。“要使旧文学一变而为新文学也许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旧文学影响之下的俗文学,却有经通俗文学的媒介,而递嬗演变为新文学的成分的可能”<sup>⑦</sup>,这一在上海沦陷时期提出的文学课题,在南北沦陷区通俗文学创作中都得到了某种完成。在社会言情小说创作中“俨然有‘南帝’之气象”<sup>⑧</sup>的予且在“通俗文学程式的某种新文学化”<sup>⑨</sup>上的努力就颇为研究者赏识。而有的论者则以沦陷区通俗小

① 卢升淑:《现代女作家文本里孤独、无力的母性——试论张爱玲、杨绛、苏青、林徽因的母性书写》,《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3期。

②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3页。

③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④ 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8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⑤ 《大众·发刊献辞》,1942年11月。

⑥ 吴福辉:《予且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⑦ 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万象》1942年第4期。

⑧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⑨ 吴福辉:《予且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说风格的形式来考察雅俗文学的互动,认为沦陷区“武侠小说几大家皆卓然自雄,风格迥异,还珠楼主长于神怪,白羽长于讽世,王度庐长于悲情,郑证因长于技击,朱贞木长于荒蛮。侦探小说有程小青代表的正格和孙了红代表的反格,滑稽小说有北派耿小的和南派的徐卓呆”,这种创作局面恰恰揭示了“通俗小说走向成熟的主要原因和主要标志便是它在保持‘通俗’本性的前提下,极大程度地高雅化了”<sup>①</sup>。至于对张爱玲、苏青、梅娘等沦陷区作家“雅俗共存”的创作,更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认为张爱玲代表的“文学由先锋状态向通俗层面运行”,是“中国 20 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场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sup>②</sup>。

## 六

如果我们意识到后殖民语境的这一情况,就可能去解开日占区文学中的一些“谜”。例如,张泉在其《沦陷时期北京文学 8 年》一书述及了华北沦陷区文学中一再出现的“颇为令人费解的‘悖论’现象”,不少作品“在日伪的体制中产生,受到当局的奖励,然而作品的主题,却是与既存制度对立的”。<sup>③</sup> 这种“令人费解的‘悖论’现象”事实上存在于从北到南的所有日占区,东北古丁的长篇《新生》、石军的长篇《沃土》、爵青的长篇《黄金的窄门》,华北梅娘的中短篇集《鱼》《蟹》、袁犀的长篇《贝壳》、林榕的散文集《远人集》、马骊的小说集《太平愿》、雷妍的中篇《良田》、萧艾的小说集《萍絮集》,上海予且的《予且短篇小说集》,台湾张文环的《夜猿》《阉鸡》、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这些作品所获奖项(如“大东亚文学赏”、“华北文学赏”、“满洲民生部大臣奖”、“皇民奉公会奖”等),无疑都是殖民体制内的奖项,有的官方政治色彩浓郁,但前述获奖作品基本上与日伪政治无染,不少作品还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对殖民统治的抵抗意识或疏离意识。这种“悖论”现象的存在再次反映出日占区文学形态的复杂性,而其中就包含着后殖民语境中的民族寓言结构生存空间的存在。除了在前面关于日占区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研究述评中已包含了“民族寓言结构”外(获奖作品大多属于这三种文学形态),相关研究还关注到了以下问题,为日占区中国文学“民族寓言结构”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一是日占区作家在不辱没民族气节的底线上,会将“纯艺术”的追求来求得文学的某些生存。从东北沦陷区“写印主义”、“非俗”艺术,到华北文坛的现代主义、“京派”余脉,到上海沦陷时期小说、戏剧界的实验性探索,乃至台湾文坛的“唯美主义”等,都可视作这一生存倾向。这种“文学自立”的追求,从战争初期延续到战争末期,确可视为“作为一个抵抗体而发挥机能的现实形态”<sup>④</sup>,必然影响到评奖结果。

二是借助于“民间市场”、“文化市场”等空间来求得殖民体制外文学的生存,甚至向殖

①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25 页。

②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16 页。

③ 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 8 年》,和平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4 页。

④ [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 页。

民体制话语进行渗透,乃至构成挑战。

有一篇研究“悖离现代文学传统的‘大东亚文学’作家”的文章,在揭示一批“不乏才情和能力,甚至有堪以自豪的过去”的作家,陷入“大东亚文学”泥淖的原因时认为:“轻视民间市场”,“悖离文化市场,淡漠读者”,以致“投靠强权政治”<sup>①</sup>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恰恰说明了,“民间市场”、“文化市场”是中国作家在殖民夹缝中求生存,乃至获得“独立地位”的重要空间,当殖民话语主宰着日占区文化空间时,这一结论显得格外重要。不少研究事实上都关注到了这一点,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沦陷区文化市场对通俗小说有着特殊的期待视野”<sup>②</sup>,不少作家在通俗小说创作中获得了“自由”言说的立足点。有的研究者在揭示沦陷区戏剧活动时,既注意到了“熟悉舞台和观众欣赏趣味的优秀编导、演员的出现,融会了外来影响并体现出民族审美风格的剧作和表演体系的确立”,更敏锐捕捉到了沦陷区话剧对“文明戏的传统”再接受的倾向,正是这种“直接依托着市场生存”的努力,使“此期上海的话剧成就代表沦陷区话剧最高成就”。<sup>③</sup>更有研究者注意到“张爱玲早在40年代就深得媒体传播的三昧。她的创造力不只投向文学,也在舞台、电影,甚至服装、社交上,颇有斩获。”<sup>④</sup>其实在沦陷区的环境中,张爱玲的这种做法实在是避免被殖民政治强权纳入其体制的一种努力。而且伪体制中的文学评奖在文化人士、作家的参与下就会较大地受到读者阅读反馈的影响,获奖作品有好几部属于畅销作品,就是一个明证。

## 七

日占区文学中“悖论”的解读还仅仅是开始,要进入这种研究的自觉阶段,在充分关注相关理论的同时,应该对日占区文学研究中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有所建构。这种中国知识应该包括对二次大战文化对峙实质的把握,对“被占领的遭遇”和日占区文学形态间复杂关系的直面,对后殖民语境中日占区文学具体领域的拓展等。我们应该直面于“抵抗者和奴隶的分际”见出日占区文学历史真相的艰难性,意识到在这一领域展开后殖民话题的复杂性。例如,已有论者指出:“由于不同的原因或机缘聚集在沦陷区的文化人”“在很难回避是非判断和政治抉择的同时,还都面临着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的问题。”<sup>⑤</sup>文化身份认同这一话题,其在日占区文学中的敏感、尖锐、复杂,决非文化认同—认异理论的套用就能应对的,因为其中不仅有着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强者和弱者、施予者和接受者、“师”者和从者的复杂关系,更有着或多种意识交织,或表里有别,乃至“交流”中的戒备,“认同”中的反抗等种种“面从腹背”的复杂状况。如果不能直面现象、直面问题、直面历史现实,后殖民语境中的日占区文学研究也是难以深入的。

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日占区文学研究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展开:一是继续

① 张曦:《悖离现代文学传统的“大东亚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② 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③ 朱伟华:《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戏剧卷·导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 王德威:《“世纪末”的福音——张爱玲与现代性》,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⑤ 张泉:《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历史、现状及展望》,《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强化史料的梳理、研读。日占区文学史料的搜寻整理,在中国大陆、台港地区,都已有了相当好的基础,但相关的研读却滞后,学术争论应该产生于双方对日占区文学史料认真研读的基础上,这样的争论才有学术建设性。这本由彭放与李春燕等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就为今后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份翔实的资料入门。二是要在二次大战的世界性背景上去拓展研究空间,例如,可从二次大战文化冲突的实质和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历史这两者的结合上去发现、开掘日占区文学研究的一些新课题。三是坚持把日占区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时期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来把握,展开多层面的比较研究,来认识日占区文学的复杂形态。例如,将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文学进行比较,将中国大陆沦陷区文学跟台湾、香港地区文学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会使我们更慎重地去看待日占区文学。四是在日占区文学研究上,中国大陆、台港地区,日本等地的研究者应该进行合作,若能形成一种互动的研究格局,必将使日占区文学研究有所突破。